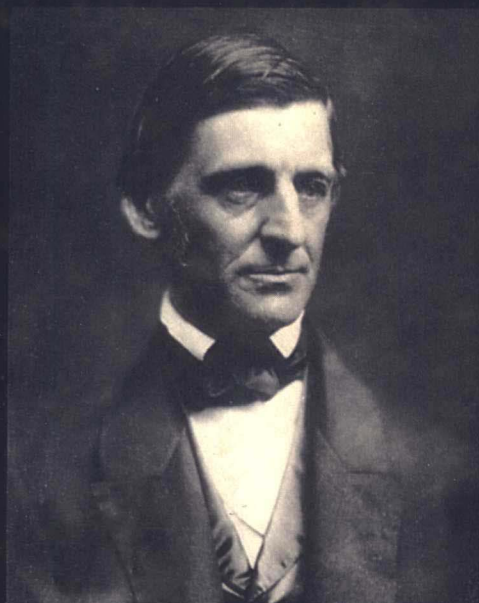




Emerson

爱默生集

论文与讲演录

爱默生集

论文与讲演录

吉欧·波尔泰编 赵一凡等译

赵一凡校

下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京)新登字007号

责任编辑:倪 乐

封面设计:海 洋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爱默生集 下:论文与讲演录/(美)波尔泰编,赵一
凡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9
(美国文库)

书名原文:Ralph Waldo Emerson, Essays and Lectu
res

ISBN 7-108-00688-X

I. 爱… II. ①波… ②赵… III. ①爱默生-文集-美国
-近代②散文-美国-近代-选集 IV. 1712.14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发行

(邮政编码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北京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1993年9月第1版 1993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20.875

字数:469千字 印数:0,001—5,000册

定价 38.00 元

目 录

第 一 章	初访英国.....	845
第 二 章	赴英航行.....	858
第 三 章	国土.....	864
第 四 章	种族.....	870
第 五 章	能力.....	888
第 六 章	习俗.....	905
第 七 章	真诚.....	913
第 八 章	性格.....	920
第 九 章	安乐乡.....	931
第 十 章	财富.....	937
第十一章	贵族.....	948
第十二章	大学.....	964
第十三章	宗教.....	973
第十四章	文学.....	984
第十五章	《泰晤士报》.....	1001
第十六章	悬石坛	1008
第十七章	人物	1019
第十八章	结果	1024
第十九章	在曼彻斯特的讲话	1030

第一章 初访英国

英国我去过两次。1833年，我在西西里、意大利和法国作短期旅行，回国途中，从布伦横渡海峡，在伦敦塔码头上岸。那是一个阴暗的星期天的清晨，街上行人稀少。我还记得初次在英国土地上漫步的快乐，陪伴我的是一位美国艺术家，我们从伦敦塔上行，穿过奇普塞德大街和斯特兰德大街，来到罗素广场的一所住宅，因为有人已经在那里给我们介绍了上好的房间。好几个月以来，我们第一次才被迫抑制住游客们的那种吹毛求疵的习惯，因为我们再也不能在大街上高声喧哗而又不被人家听懂。商店招牌上写的是我们的字；门牌上镌刻的是我国人的姓名；公共和私人建筑物更具有有一种故土上司空见惯的门面。

像当时的大多数青年一样，我从爱丁堡人和《爱丁堡评论》同仁那里获益匪浅。受惠于杰弗里、麦金托什、哈莱姆、受惠于司各特、普莱费尔和德·昆西。我读书有限而又杂乱，但这已经激发我想和三四位作家见面——柯勒律治、华兹华斯、兰多、德·昆西，以及批评杂志最近而又最强的撰稿人卡莱尔；我生病期间接受劝告去旅行，我想如果我选择到欧洲去的理由，恐怕主要就是这几个人的吸引力了。如果歌德仍然健在，我也许会漫游到德国去。除了我提到名字的这几位之外，（因为司各特已经作古），英国在世的人当中没有我想见的了，除非是威灵顿公爵，此人后来我参加威尔伯福斯的葬礼时在威斯敏特教堂见到了。年轻的

学者以为能跟洞察世情的人生活在一起真是幸福之至，岂不知他们也是他们自己的思想的囚徒，他们不会专注于你的思想。文学成就的境况几乎损害了最优秀的社交能力，因为这些境况不允许有你邂逅一位最要好的朋友时的那种轻狂。很有可能，当你跨陆过海与名作家周旋时，你把天生的明智和生命的平等留给酒店或农场里的某个默默无闻的同志。然而，我发现作家比他们的著作高明，而且我坚持我最初的信念：一个坚强的头脑将会很快清除这些障碍，给人以实际的满足，给人以已经晤面的感觉，和一种更为广阔的视野。

查阅了我 1833 年的旅行日记后，我发现在我访问地方的杂记中，没有什么值得发表的东西。然而我抄下几条访问人物的笔记，因为笔记上尊崇的有关人物都是出类拔萃、举世瞩目的，因此没有必要假装正经对这几位大名鼎鼎的人物玩什么藏头露尾的把戏了。

在佛罗伦萨，主要是在众多的艺术家中间，我发现了美国雕刻家霍雷肖·格里诺。他面目英俊，体形优美，如果说他的《梅朵拉》的面孔和阿喀琉斯巨型泥塑像都是对他自身理想化的表现，他也会被原谅的。格里诺是个卓尔不凡的人，热情奔放、口若悬河，他的一切见解都崇高而恢廓。他相信希腊人已经在学校或联谊会里产生了影响——大师的天才把他的设计传达给他的朋友们，用它激起了他们的热情，当他精力衰竭时，一名新手，以同样的热情，把工作继续下去；这样通过接替，直到工作的每一部分都以同样的热情完成为止。这一点在岩石这样一种难以驾驭的材料中十分必要；他认为只有我们离开我们幽僻、戒备的道路，像他们一样在社会上工作，艺术才会繁荣。他的所有思想都洋溢着同样的豁达。他是一个精确、深沉的人。他崇尚希腊人，无法

容忍哥特式艺术。他的建筑学论文发表于1843年，开了罗斯金关于建筑道德观念这一主导思想的先声，尽管他们关于艺术史的观点大相径庭。我存着他的一封亲笔信——后来写的，但崇尚的还是同一个时期——在这封信里他粗略地勾勒了他自己的理论。“我的建筑论是这样的：按照功用和地点，科学地安排空间和形式；强调与它们在功用上顺次排列的重要性相称的特点；按照严格的有机规律决定、安排、变换色彩和装饰，每一个决定都要有一个明确的理由；全部、立即清除一切顶替和虚构。”

通过一名共同的朋友，格里诺给我带来了兰多先生的一封请柬。兰多先生住在圣多米尼加迪菲索尔。5月15日，我同兰多先生一起用餐。我发现他崇尚而有礼，他住的格拉德斯加别墅里，绘画如云，那座精美的住宅俯瞰着如画的风光。我本来从他的一些著作中推断出，或者从某些轶闻趣事中夸大了一种阿喀琉斯式的盛怒的印象——一种桀骜不驯的暴躁。我不知道这种非难是否公正，当然五月的这一天他的彬彬有礼掩饰了那高傲的心灵，所以他是一个最耐心最和蔼的主人。他赞美佛罗伦萨遍地生长的美丽的仙客来；他仰慕华盛顿，谈到华兹华斯、拜伦、马辛杰、波蒙和弗莱契。当然他有定见，喜欢惊人之词，如有可能，他很愿意用他那英国式的奇思异想谈论那不可改变的过去。伟大的人物都没有伟大的儿子。如果腓力和亚历山大也不算例外的话，他称腓力为那位更加伟大的人物。在艺术中，他喜爱希腊人，在雕刻上，他唯一喜爱的就是他们。他喜欢《维纳斯》胜过其他一切，其次，就是亚历山大的头像，它就在这里的陈列馆里。他喜欢波洛尼亚的约翰胜过米开朗琪罗；在绘画中，喜欢拉斐尔；对佩鲁吉诺和早期大师们兴趣也日益增加。他认为希腊历史著作是唯一的好作品；其次就是伏尔泰的。我无法使他赞赏麦金托

什,和我的一些更近的朋友;也无法使他衷心地赞扬蒙田——沙朗也是一样,这样做似乎有不分青红皂白之嫌。他认为德吉兰多受益于《卢卡论幸福》和《卢卡论神圣》他用骚塞来纠缠我;可是骚塞是何许人也?

他约请我星期五去吃早餐。星期五我没有失约,这一次是同格里诺一起去的。他立即朗诵了裘力斯·凯撒的五六行六韵步诗为我们助兴——他说是多那图斯的。他对切斯特菲尔德勋爵有些过奖,对柏克和苏格拉底却有微词;他把华盛顿、福西翁、提摩勒翁叫做三大伟人;就像我们的果树学家们一样,在他们的名单上选出三只或六只最好的果子“代表一个小果园”,他甚至连他们名字近似的词尾都不放过,*也要加以评论。“一个伟大的人物,”他说,“应当做出伟大的牺牲,应当宰杀他的一百头牛,却不知道它们会被神祇和英雄们享用掉,还是苍蝇会把它们吃掉。”在此之前,我已经拜访过阿米奇教授,他让我看了他的显微镜,据说能放大两千倍;我谈到了那些显微镜的用途。兰德瞧不起昆虫学,然而,他同时还是说,“崇高就在一粒尘埃里。”我想我当时提起一些新近的作家跟他开玩笑,可是他声称他从来没有听说过赫歇耳,甚至连名字也没有听说过。有一间屋子里挂满了画,他喜欢向人进行展示,尤其是其中的一幅,他站那幅画前说,“如果谁能保证它就是多梅尼奇诺的真迹,我就给他 50 吉尼。”我更想看看他的藏书室,可是有一位客人 H——先生告诉我,兰多先生有把书送人的习惯,所以每一次房子里最多只有十来本书。

* 上述三个人的名字用英文写出来分别是 Washington, Phocion, 和 Timoleon, 都以 on 两个字母结尾。——译者注

英国人喜欢想入非非，仿佛这突出地表明了他们居主导地位的自由似的，兰多先生把这种爱好推向了它的高峰。他有一个神奇的头脑，专横，狂暴，永不枯竭。本来是一块当兵的料，可是造化作弄，使它转向了文学。在文学上，没有一种风格、没有一种特色他不是了如指掌的，不过对行动和英雄还是怀着一种英国式的喜爱。做过的事才顶用，只是说说不算数。自出机杼的一个句子，向前迈出的一步，比所有的指责都更有价值。奇怪的是，兰多在英国的评价不高，常通被人忽视，有时候还在《评论》刊物中受到恶毒的攻击。批评无论对还是错，很快就被遗忘；然而年复一年，学者们仍然必须回到兰多那儿去探求大量精彩语句——探求智慧，机敏和义愤，这一切却是不能忘怀的。

8月5日，我从伦敦到了海格特，给柯勒律治先生写了一个便笺要求允许我拜访他。快到中午了，柯勒律治先生捎来口信，说他在睡觉，但是如果我愿意在一点以后来访，他乐意见我。我于一点钟又回来，他露面了，一个矮小、臃肿的老头儿，一双明亮的蓝眼睛，气色非常好，拄着手杖。他频频地吸鼻烟，这样一来很快就弄脏了他的领带和整洁的黑色西服。他问我是否认识奥尔斯顿^①，并热情满怀地谈到他们在罗马认识时，奥尔斯顿有些什么优点，正在做些什么，他是个提香式的大师，等等，等等。他谈到钱宁博士。他竟然是一个一位论派教徒，真是不幸得叫人难以启齿。说到这里，他突然慷慨激昂地讲起一位论派的愚蠢无知。——真是岂有此理；说着就随手从桌子上拿起一本沃特兰主教的书，他激动地读了两三页他自己写在空白页上的话——我相信这些段落也印在《思维之助》中。趁他停下来歇口气的时候，我插嘴说，“尽管我极其尊重他的一切解释，我还是不得不告

诉他，我生在一个一位论派信徒的家庭，而且从小受的就是这种教养。”“不错，”他说，“我想是这样，”他又像刚才一样，又接着往下讲。“多少世代以来，人们毫无疑问地默认圣保罗的教义——三位一体的教义，而且按照菲洛·朱迪厄斯的说法，也是基督以前犹太人的教义——这一小撮教士竟敢挺身而出，加以否认，真是不可思议等等，等等。他非常遗憾：钱宁博士——一个他所仰望的人——不，说仰望未必是真心话；然而，一个他兴趣盎然地正视着的人——竟然信仰那种观点。他看见钱宁博士时，他已经对他暗示他担心他是因为那可可爱和美好的东西而爱基督教的——他爱的是里面的善，而不是真；我告诉你，先生，我知道有十个人爱其中的善，只有一个人爱其中的真；然而，为了真而爱真比为了善而爱善好百倍。他（柯勒律治）对一位论派一目了然，因为他曾经就是个一位论派的信徒，所以他知道那是一种什么货色。他曾经被誉为‘一位论教派的一颗新星’。”他继续阐述，或者勿宁说剖析：“三位一体的教义是唯实主义；上帝的观念不是本质的，而是超本质的，”他谈到“三位一体论”（trinitism）和“四位一体论”（tettrism），还有更多的东西，其中我只能领会这样一点，“意志就是一个人赖以成为一个人的东西；因为，要是有人在街上挤了我一下，我把我另一侧紧挨着的那个人挤到了阴沟里，那我就应当立即惊呼，‘这不是我干的，先生，’意思就是这不是我的意愿。”我也听懂了这样的话：“如果你在英国坚持你的信仰，我坚持我的信仰，那么我的就是柴捆较热的一面。”

我利用一次停顿的机会说道，在美国他拥有很多读者，探讨他所有的宗教观点，我进一步询问登在《朋友》第三卷上的独立派小册子的“摘录”是否是一段真正的引文。他回答说，那的确是从他手里的一本名为《一个独立者的抗议》的小册子上选的，

或者大意如此。我告诉他我认为那段文字精彩极了，我非常想看看全文。“不错，”他说，“那人是一团混乱的真理，而不甚明白上帝却是一个有秩序的上帝。不过毫无疑问，那一段摘引的文字比原文更会打动你，因为我已经把它过滤过了。”

我站起来要走时，他说，“我不知道你是否喜欢诗，不过我想背诵一下我最近在我的洗礼纪念日做的几首诗，”说罢就站起来音调铿锵地朗诵了十来行诗，开头是：

“生给上帝以基督——”

他问我一直在什么地方旅行，得知我到过马耳他和西西里，他便把两个岛屿进行了一番比较，“重复他从该地区回来后对伦敦主教说过的话：西西里是一所优秀的政治经济学校；因为在那里的任何一个城镇，只需问一下政府颁布了什么法令，然后把它倒过来，就会知道应当干什么事情，那是与任何善良明智的事物完全针锋相对的法规。政府带进那快乐的花园的只有三件事，即：疥疮，水痘和饥荒。而在马耳他可以看见法律和理性的力量正在使那半阿拉伯居民的荒凉岩石变成人口稠密、物产丰富的场所。”出来的时候，他在隔壁的一个房间里让我看了一幅奥尔斯顿的画，并且告诉我，“一个名叫蒙塔古的画商有一次来看他，看到这幅画时，他说道，‘哟，你可搞到了一幅画！’因为他想这是一名古代大师的作品，后来蒙塔古背对着画面继续说话，却举起一只手把它摸了一下，便惊叫起来，‘天哪！这幅画连十年都不到呐，’——此人的触觉非常灵敏高明。”

我跟他相处了大约一个小时，然而，要回想起他的绝大部分谈话是不可能的，那些话往往很像印在他的书里的许多段落——也许完全一样——他很容易陷入某种老生常谈之中。正如我可以预见到的那样，那次访问与其说谈了一次话，不如说开了

一次眼，除了满足了我的好奇心外，再没有任何用处。他年事已高，又心事重重，不会屈从于一个新伙伴，和他一起思想的。

我从爱丁堡到了苏格兰高地。归途中，从格拉斯哥来到邓弗里斯，由于一心要转交一封我从罗马带来的信件，我就打听克雷根普托克。那是尼思河谷的一个农庄，归十六英里之外的邓斯科尔教区管辖。公共马车都不从它附近经过，因此我从客栈里雇了一辆私人马车。我发现那幢房子被石南丛生的荒山环抱着，那位寂寞的学者原来就在那里培育他那颗伟大的心。卡莱尔是个早熟的人、一个用不着对读者有所隐瞒的作家，是一个见识极为广博的人，却又鲜为人知，放逐在那个山庄上，仿佛在按照他自己的主张掌握伦敦最好的东西。他身材瘦高，额如峭壁，镇定自若，能言善辩，而又从容不迫；他那明显的北方口音决不更改；他一肚子的轶闻趣事，一种滔滔不绝的幽默把他所观察的一切都能漂浮起来。他的谈话像玩笑似地升华了那些司空见惯的东西，所以使朋友立即认识了他的家神和灵魂，而且，了解到什么东西注定要成为一个美丽的神话，倒是件非常高兴的事。但这样的东西寥寥无几，本人又寂寞，“方圆十六英里除了邓斯科尔的牧师之外，再没有一个人跟他说话，”这样一来，书籍就不可避免地成了他的话题。

他对经常谈及的一切事物都有他自己起的名字。《布莱克伍德月刊》是《沙子杂志》；与生活前景关系更为密切的《弗雷泽杂志》则是“泥巴杂志”；用来表明某家破产企业的一条近道却是“最后六便士的坟墓”。如果对任何天才的过奖惹恼了他，他就大声宣称他钦佩他那口猪所表现出的才能。他已经花了不少时间千方百计要把那个可怜的畜牲关在圈里的一个围栏里，可是猪有非凡的判断能力，它已经发现怎样把一块木板弄下来，结果使

他的计划落空。尽管如此，他仍然认为人是这个星球上最富有创造力的小家伙，他喜欢尼禄的死，“Qualis artifex pereo!”^②胜过大部分历史。他崇拜一个会向他揭示任何真理的人。他曾一度大量研究美国问题，读过不少有关的书籍。兰多的原则仅仅是反叛，而他所害怕的正是美国的原则。据他所知，那个国家最好的事就是：在那里，一个人干了活就有肉吃。他曾在斯图尔特的书中读到这样的事：他在纽约的一家旅馆打听在哪里可以买到靴子，他被指到街对面，结果发现芒戈在他家里吃烤鸡。

我们谈到书。柏拉图他不读，他认为苏格拉底不足为训；逼急了，就硬说米拉波是一位英雄。他把吉本称为旧世界通往新世界的宏伟桥梁。他读书很杂，《项狄传》是继《鲁滨孙漂流记》之后他最欣赏的著作之一，而罗伯斯顿的《美国史》则是一本他早期所喜爱的著作。卢梭的《忏悔录》使他发现，他不是个笨伯；他学德文已有十年了，因为一个人告诉他，他会在那种语言中发现他所需要的东西。

他对眼下的文学抱一种绝望或讽刺的态度；他列举了一下大书商们一年花在广告上的令人难以置信的钱数，从而得出结论，现在没有一份可信的报纸，没有人买书，书商们濒于破产。

他仍旧回头谈英国贫民，拥挤的国家，公职人员自私自利，放弃了所有应尽的职责。“政府应当指导穷人做些什么。爱尔兰的穷人来到这里的荒野上流浪。我的太太规定给每一个亚当的子孙都要给面包吃，并且给隔壁的房子提供了他们的必需品。可是，这里有成千上万英亩的土地可以给他们提供肉食，可就是没有人叫这些爱尔兰穷人到荒野上去耕种它。他们把一个个草堆烧掉，这样就找到了一个办法，迫使那些有钱人照顾他们。”

我们出去到连绵的小山上散步，望着克里费尔，然后他不戴

帽子，远眺华兹华斯的住地。我们就在那里坐下，谈起灵魂的不朽。我们谈这个话题并不怪卡莱尔，因为他天生就不愿意让每一个灵敏的精神碰壁，不喜欢把自己置身于无路可走的境地。然而他是个真诚的人，认识到了把各个时代连在一起的微妙的链条，看到了每一起事件怎样影响着整个未来。“基督死在一棵树上，那棵树建造了那边邓斯科尔教堂，那个教堂又把你和我带到一起。时间仅仅是一种相对的存在。”

他已经在用一名学者欣赏的目光注视着伦敦。伦敦是世界的中心，他说，只是由于人口密集才显得神奇。他喜欢大机器。每一台能自行运转。面包铺的伙计每天在固定的时间把松饼送到窗口，在这个问题上伦敦人就知道这一点，或者希望知道这一点。然而伦敦也出好人。他提到了一些人的名字，特别提到一位文学家，也就是他的朋友，他认识的最优秀的心灵，伦敦对此人特别优待。

8月28日，我到赖得尔山拜访华兹华斯先生。他的女儿们把父亲叫了进来，一位相貌平常的白发老人，并不怎么吸引人，戴了一副绿色护目镜，显得有些破相。他坐了下来，讲话非常简练。他刚刚旅行回来。他的健康状况很好，可是跟两个律师一起走路时跌了一次跤，把一颗牙碰掉了，他还说，幸好这事情没有发生在四十年前；因而他们十分赞赏他的哲学。

关于美国他有很多话要说，如果它给他喜爱的话题提供了机会，要说的就更多了。他喜爱的话题是：一种肤浅的讲授给社会的启蒙跟道德文化对它的约束完全不相称。学校起不了好作用。讲授不是教育。他关心环境教育胜于关心讲授教育。问题不在是否有法律认识到的罪过，而在是否有法律认识不到的罪

过。罪恶是他所畏惧的东西，而且社会怎样会逃脱这种根源而又不造成最严重的危害——？他甚至说，那简直像一个悖论：人们需要在美国打一场内战，好教人知道加强社会关系的必要性。他说，“也许美国的风气有些庸俗，不过那不要紧。事情在草创阶段就是这样。可是我担心他们太热衷于挣钱；其次就是太热衷于政治；他们把政治区别当成目的，没有当成手段。我担心他们缺乏一个有闲阶级——简单地说，一个绅士阶级——给社会一种光荣的风气。我听说那里的二流社会阶级把一些事情吹得神乎其神，而这些事情在英国——上帝知道，在英国天天都在做，可是从来没有人提起。在美国，我想知道的不是有多少教堂和学校，而是有些什么报纸？我的朋友汉密尔顿上校就住在山下，他在美国呆了一年，他向我保证说那里的报纸非常厉害，它们竟然指控国会议员们偷汤匙！”他不赞成对英国报纸免税，因为它们会被低劣的印刷内容淹没，而改革家们把对报纸课税说成是对知识课税。他说，他之所以谈论政治方面的问题，是因为他希望给我和所有优秀的美国人留下一个印象，要培养道德，培养保守主义，等等，等等，而永远不要诉诸于人们的体力，就像刚刚在英国的选举法改革案中所做的那样——这正是德洛尔姆预见到的事。有一两次他提到他跟钱宁博士的谈话，因为钱宁最近访问过他，（同时把一只手放在那位博士曾经坐过的一把特殊的椅子上。）

谈话转到书籍上。他认为卢莱克修是比维吉尔高明得多的——一位诗人，并不是在他的体系上，那算不了什么，而在他举例说明的能力上。要说明任何事情，要把上帝的先见跟人类罪恶调和，信仰是必不可少的。至于库辛，（我们在波士顿都一直在读他的演讲录），他仅仅知道这个名字。

我问他是否读过卡莱尔的批评文章和翻译。他说，他认为他有时候有些癫狂。接着他肆意攻击起歌德的《威廉·迈斯特》来。满书充斥着五花八门的私通。那就像苍蝇在空中杂交。他看了第一部就再也看不下去了；实在令人作呕，他把书都扔到房间那边去了。我对这种愤怒不敢苟同，并且尽力陈说这本书大部分还是好的；他非常客气，表示往后再看一看。他说，卡莱尔的文章写得晦涩透顶。他又聪明又深沉，然而他公然蔑视大家的同情。即便柯勒律治先生也写得比他明白，虽然他总是希望柯勒律治多写一些好懂的东西。他把我领进他的花园，把那条砾石路指给我看，他的成千上万行诗就是在那里吟成的。他的眼睛光彩熠熠。除了耽误一点阅读之外，这样做决不是损失，因为他从来不写散文，而在写诗之前，他已经打好了千百行腹稿。那时他访问过斯塔法岛后刚刚归来，他三天之内作了三首写芬戈尔洞的十四行诗，他被叫进来见我的时候正在作第四首。他说，“如果你对诗歌感兴趣，说不定会喜欢听这几首诗的。”我欣然赞同；他回忆了片刻，然后向前一站，一首接一首非常起劲地把那三首完完整整的十四行诗背诵出来。我想第二首和第三首比他往常的诗歌还要美。第三首是献给花儿的，他说，花儿，特别是牛眼雏菊，在那里的岩石顶上非常繁茂。第二首影射那个洞名，在诗里叫“音乐洞”；第一首写那个洞被轮船上乱七八糟的一伙人游览的情况。

这样的朗诵是始料不及的，因而使人惊讶不已——他，那个老华兹华斯，站在一边，在一条花园小径上给我朗诵诗，活像一名小学生在背书——所以起初我简直忍俊不禁；然而我回想起来我不远万里是来看望一位诗人的，他现在正在给我诵诗，我明白他是对的，我是错的，于是便高高兴兴、全神贯注地听起来。我告诉他业已刊行的为数不多的篇什大大刺激了占有他未发表的